

知青40年特别报道

燃情岁月·访谈



做知青专题,讨论有关知青的话题,在中国没有谁比梁晓声更合适的了。这位写出了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雪城》等一系列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的老知青,被很多人当作是知青的代言人。9月18日晚,“面对”快报记者,电话那头的梁晓声侃侃而谈,有意思的是提到“知青”,他并没有使用“我们”,从他嘴里冒出的更多的是诸如“他们”“你”“这代人”这些明显保持距离的词——多年过去,这位当年充满激情的理想者显得客观和理性。但是当记者的提问显得“外行”,或者“曲解”了有关知青的某些概念时,梁晓声不再好脾气,作出了激烈的反击。“谁说都是理想主义者?前面不是说了吗,有哭的,有不愿意去的,这叫理想主义吗?那么小的年纪,还未成年,怎么个理想啊?”在那一刻,记者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梁晓声。这个人还在较真地为知青“代言”。

梁晓声：被时代抛掷的一代

知青怀旧很正常

星期柒新闻周刊:1968年12月,毛主席发出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最高指示,到今天已经40年了。因为是个整数年,很多当年的知青今年都忍不住怀旧起来。在南京,前些天,有400多位当年在内蒙古插队的老知青,集体前往内蒙古“省亲”。您对这股集体的怀旧情绪怎么看?

梁晓声:任何人都是怀旧的,人本身就是怀旧的动物,甚至高级一点的动物也是怀旧的。怀旧本身是高级动物和低级动物的一种区别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怀旧的个人和群体。所以这是非常自然的事。如果说有区别,首先就是当年这个群体非常庞大,它几乎是整整的一代人。对于每一个城市来说,都是一个很大的青年群体。第二,上山下乡的时间段,正好是他们的青春。这两点决定了这个怀旧现象本身是一个集体现象,呈现由大都市回望乡村和边陲地区的形态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据我所知,处于集体活动中的老知青们,很感慨地表达了对曾经“战斗”过的地方的思念之情,不少人把一个个昔日的知青点当成人生开始的地方和第二故乡。

梁晓声:这也非常正常。因为当年下乡的时候,知青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——小初中,我们叫69届。按今天说法,他们还未成年。另外呢,他们离家非常远。应该说这一代人,他们真正的成长期,是从下乡之时开始的。在那里他们要过集体生活,在那里他们要适应不同的地理气候。南京是南方气候吧?冬天也不是非常寒冷,他们到内蒙,到北大荒,对地理上、季节上的适应是他们必须要过的一关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您在北大荒碰到过南京知青吗?

梁晓声:没有碰到,但南京知青很出名。当年有一首《南京知青之歌》就是南京知青写的。

有的人唱着歌回去,有的人黯然神伤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我注意到知青们这次回去,带着老照片,一路唱着当年的歌,情绪非常热烈,似乎当年留在他们记忆中的都是些美好的人和事。但是我们知道知青生活很复杂,并不单纯,这其中是否有一些相对消极的记忆给覆盖掉了?

梁晓声:你这个问题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。你提出了一种质疑,是吧?我这话应该说到你根子上了。其实这没有什么可质疑的。你想他们现在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了,终于可以故地重游,那里曾经流浪、放逐过他们的青春,他们又是集体回去,无论当年多么苦多么累,应该是高兴的事,他们毕竟不是回去上坟啊,是不是?也不是搞学术研究。这就是这一代人快乐的集体旅行,只不过旅行地是他们曾经放逐过青春的地方而已。他们当然要快乐,要唱歌,唱歌当然要唱当年的歌。唱当年的歌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当年的岁月多么肯定,对那个时代多么多么缅怀,然后得出这代人多么冥顽不化,不与俱进。

如果这样想的话,(你们)就太自以为是了,也不能理解人心是怎么回事。是不是?像我这样的人,要我唱歌的话,我新歌也不会多少,要唱必是老歌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您的意思是这是一次很自然的“回乡之旅”,没有必要掺杂那些理性的、价值判断的东西?

梁晓声:对于50多岁的人来说,这个旅行非常自然。当然这里面,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情况。比如说,家庭出身非常不好,按当年来说,然后在下乡的时候受到过歧视,甚至受到过很不公平的对待,那么小的年纪,肯定心灵深处会留下创伤。我想这样的人是很难和另外的人一起唱着歌回去的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是,他回不回去,可以自己选择。

梁晓声:一个是他可以自己选择,一个是他有可能是单独一个人回去。即使他带着儿女回去的话,他也跟另外一些人不一样的。他会向儿女们举证,自己当年在这样一个地方经历了自己人生的低谷,为了教育儿女,让儿女了解自己,那方式,那情绪都是不一样的。你们南京当年去内蒙古有1000多人,这次回去也不过只有400多啊,不到一半,这本身也说明一些问题啊。

真相并不在新闻纪录片里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知青是一代人,有1700万之多,其实他们也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人?

梁晓声:是。应该说是可以分成一类一类。一类一类是很不一样的,确实有的人一腔热血,写血书,跟家里吵翻,无怨无悔,这是一类。还有一类就是没有离开过家,不敢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地方,家里也不放心,被逼走的。同样被逼走的,有的是红五类,他们到那里去以后还可以任性一点,反正出身好别人也没有办法;还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,到了那里去以后,有可能被划入另册对待。同一个类型的人容易聚集在一起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您说的这些,正好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个问题,就是——你们这一代人,当初去农村,是一种无从选择的命运,还是一种自觉的选择,写决心书啊,血书啊什么的?

梁晓声:你提出这个问题,就好像你对那个年代一点都不知道。采访之前翻一下资料,你就会发现,真相并不是如新闻纪录片留下来的那样,唱着歌,欢笑着,好像是一声令下,大家像战士一样欢欣鼓舞地去,这只是现象的一面。你知道我们的历史有多少是不真实的?火车站上会有哭声,哭泣的人会与家人依依不舍。你从新闻纪录片里看不到这些。你从那个时代的宣传画中也看不到这些。你只要翻看一点当年的资料,看一些知青的回忆,就能了解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很复杂,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?

梁晓声:也很简单。

磨炼了一代人,也耽误了一代人

星期柒新闻周刊:那么多年过来以后,你怎么评价知青生活,评价这一代人,

这一代人经历的青春岁月?

梁晓声:我觉得说评价都是愚蠢的。它的前提是建立在,对大多数人来说,这不是一种选择。它是一种被时代所抛掷的命运。这个时代不是抛掷个人,而是抛掷群体,抛掷一代人对那个时代来说是轻而易举的。是一种不可抗力。人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,没有选择。那你说应该对它作出什么评价呢?很难用几句话来评价它。如果我们从积极一面来评价的话,就是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命运,它磨炼了这一代人。从另一端评价呢,正是这样一种抛掷,它也耽误了这一代人。这一代人当时好多高中生是可以上大学的。而当时这么做,为了国家,不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嘛,解决稳定问题嘛,因为这么多青年又不能就业,又不能上学,在文革时期。这三方面,你单独地从任何一方面来评价的话,都会有失偏颇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插队落户的10年间,知青们看到,经历了很多,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作用呢?

梁晓声:我本人对那个年代,对强大的外力来扭曲青年人的成长和人性,始终是持批判态度的,决然否定的。另外一方面,我同时也会看到,这一代青年接触了中国最典型的农民,包括牧民,这10年,他们和人民这个最大的群体结合在了一起。人民不是课本上的概念,而是左邻右舍的王大伯、李大娘。他们看到了贫穷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他们中很多人,去的时候还未成年,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个社会是很复杂的,虚伪啊,世故啊,成人世界里有许多被政治口号掩盖的不好的东西。

梁晓声:你说的也不全对。事实上,相比起来,在那个非常时代,大都市里的人所遭遇的扭曲程度远比乡村,比如内蒙古这样的地方要深得多。恰恰是到了乡村,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相对远离时代病态的人。那里的人要比城市里的人单纯得多。因为那是民间。那是真正的民间,它远离了政治的漩涡。当然极左的末梢会伸到任何地方去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他们从当地人那里学到了美好的品质。

梁晓声:你会发现大多数写作的知青,在他们的笔下,他们对当地的人民都是有感情的,史铁生的《我那遥远的清平湾》,韩少功的《西望茅草地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都是这样。这说明了一个事实,而且这并不全是美化。一些知青在谈起这段岁月的时候,其中最使他们魂牵梦绕的是当地老乡。你刚才忽略了这一点,好像他们是到了一个非常虚伪的地方。与城市相比,老乡们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的记忆,包括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《绿叶》,都传达了这种情感。而今天知青们回到旧地,还是会经常问起老乡。

大多数知青下乡是被迫的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知青拼命地想回城,好像他们对乡村并不很留恋?

梁晓声:按人性来说,家在哪儿,他一定要回到哪儿去。父母在哪儿,他一定要回到哪儿去。还有,你要看到城乡是有三

大差别的。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,去乡村并不是他们主动的选择。他们是被迫的,他们当然要回去了。这还用说吗?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但是有一种说法是知青都是理想主义者?

梁晓声:谁说了?谁说都是理想主义者?有人说吗?前面不是说了吗,有哭的,有不愿意去的,这叫理想主义吗?那么小的年纪,还未成年,怎么个理想啊?是不是?

知青是那个时代的鲁滨逊

星期柒新闻周刊:10年的生活,对知青后来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梁晓声:事实上有两点。第一点,我们跟一部分人民,也就是农民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以后,会培养起你对人民的一种情怀。这种情怀会使你看到对百姓不公,看到损害百姓利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,你会非常气愤,因为你曾经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关系非常紧密。你会有机会碰到那地方来的人,你一定会问,那里的生活怎么样了,那里变化了没有,发展了没有?第二点,这代人不会再怕吃苦了。这代人在荒郊野外,他会知道怎么生存下来,怎样挖个洞,怎样挖个临时的草房,只要给他一把镰刀,说句实在话,他可以像鲁滨逊一样生存下去。他比没下过乡的人,耐受力要强。这是一种收获。还有,后来的几代人,他们的眼里总是望向大都市的,而知青一代从都市走到乡村,一路走,看到的是他们想都没想到的贫穷、落后。所以这一代人对中国这个大概念的认识很早就脱离了书本,脱离了宣传,变得更接近真相。这些都是正面的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负面的影响呢?

梁晓声:失去了学习的机会,也无法对父母尽应该尽的子女的义务,离家那么远,是不能轻易探家的。好多人友情、爱情都曾经被扰乱过,但你也不能把这简单地说是上山下乡造成的,那是文革时期啊。你在哪儿都一样。

永远不漠视牺牲精神

星期柒新闻周刊,最后一个问题。在您的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中,女指导员牺牲在了北大荒。读了以后,人们会感受到一种悲壮、一种英雄情结,相信那也是您的感受,30年过去,您的感受还一样吗?如果您重写那个故事,会不会有所不同?

梁晓声:知青不是北大荒的第一批创业者,在他们之前有1966年转业的一批官兵,那些官兵在1966年的时候也是20多岁啊,在1966年以前,又有1958年的10万官兵,凭什么知青说我们就那么值得悲悯,人家呢?他们在北大荒用艰苦卓绝来说是绝不夸张的。他们牺牲了很多人。只不过我写的是知青小说,但知青人物身上体现了北大荒这块土地上的从1958年开始的那种牺牲精神。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。这种精神30年前我不能漠视,现在也不能漠视。无论当时还是现在,这种精神是一种客观。凡是艰苦的地方都有这种精神。



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。祖籍山东荣城,出生于哈尔滨市,1968年插队北大荒。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,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,真实、动人地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、求索与理想。代表作有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雪城》《年轮》等。现居北京,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。